

“90 后先生”与“60 岁学刊”

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



董鉴泓先生在家中
黄申 摄

他是同济大学规划学科最早的 6 位教师之一，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专业教材；他在 1960 年代发起对平遥等历史文化城市的保护。1996 年离休后，他继续担任由其于 1957 年创刊、几乎被所有期刊遴选系统收录为核心期刊的学刊主编，耄耋之年开创了被誉为“规划学科博鳌论坛”学科论坛、组织了人称“规划学界范长江新闻奖”的论文评奖。

他，是今年 92 岁高龄的中国规划界前辈董鉴泓先生。

初见董鉴泓先生，是在他出院第二天。这位 1949 年 3 月加入地下党的离休干部，因心脏不适在医院足足躺了一个月。“无聊。”董先生说，“除了看看电视新闻、刷刷微信，其他都干不了”。“十一”过后，他告知编辑部说不用搭支架，第二天就能出院，大家都很高兴。说着，老先生言语中又流露出一丝遗憾，早知道不搭支架，这一个月何必浪费在医院里？

住院期间，《城市规划学刊》编辑部的黄建中、王雅娟、肖建莉去看望过他，为他带去了“精神食粮”——两篇投稿，请“主编大人”定夺能不能用。老先生半躺在病床上，仔仔细细读完了稿子，而后召集三人围在床边，就地开了个编辑部会议。

“我还是喜欢有个什么东西对着讲。”说完，老先生掏出张 A4 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，“这是我的答案提纲，下面我就按顺序回答你的问题吧。”

从天水到上海

“1926 年，我出生在甘肃天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”董先生回忆，早年祖父经商，家境殷实。待父辈 8 人分了家产后，他家只保留了少量的土地和房产。祖母是甘肃陇西官宦人家的千金，生长在广西，儿时家里请了先生上门教书，是那个年代罕见的有文化的女子。民国初年，嫁到天水的祖母在当地办起了第一间女子小学，并当了几十年校长。父亲从教多年，是当地小学、中学的算术老师。

从祖母这边看，董先生承了祖业，家中三代为师。

不过，董先生儿时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一名技术人员。抗战时期，天水是交通要道。1939 年，国民当局提出要把陇海铁路从宝鸡向天水延伸。1941 年 2 月，交通部在天水成立了西北公路管理处。当时，西北公路工务局也在天水办公。“我经常看到很多东南地区来的工程师在野外搞测量、修桥，他们看起来气度不凡，听说待遇也不错，我就想干这行。”董先生笑道，这完全出于孩子气的心理，后来读大学时，在李庄看到林徽因等原本可以在国外过着养尊处优日子的前辈，为守护中国建筑如何呕心沥血，才真正理解这份职业的使命。

1945 年，董鉴泓离开家乡去重庆考大学。他拿着家中亲戚“众筹”的路费，搭上苏联提供的往返于甘肃和重庆的运油车，到九龙坡参加统考。当时他一心想考交大土木系，不料考数学时不慎将墨水翻到卷子上，“结果数学分数很低，进不了交大”。他又报考了单独招生的同济土木系。“当时同济土木系并不有名，没想到 7 年后院系调整，同济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以土建为主的大学，交大土木系也并入了同济。”

董鉴泓最初在李庄读书。1946 年 5 月，同济学生开始分批迁回上海。由于在吴淞的校舍惨遭日军炮火轰炸，各院系分散在市内十几处地方上课。董鉴泓所在的土木系属工学院，在其美路（今四平路）日本中学上课。当时，从德国归来的一批留学生承担起系里的教学

任务，比如系主任李国豪、教建筑的冯纪忠、教城市规划及市政工程的金经昌等。“学术水平很高，人也正派，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。”董先生说。

开启历史文化城市保护先河

1950 年董鉴泓即将毕业时，传来淮河泛滥成灾的消息，他响应国家号召参加治淮工作。“生活在灾区这一年，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了解民情的信念。”他说。

1951 年，董鉴泓毕业留校工作。1952 年院系调整，华东地区十几所高校土建系科集中到同济成立建筑系，名家云集。1952 年，建筑系成立城市规划教研室。董先生说，当时由于苏联土建类专业目录中没有“城市规划”这个名字，只能先用

“都市计划与经营”命名，后改为“城市建设与经营”。这一年，董鉴泓与金经昌、冯纪忠、哈雄文、李德华、邓述平 6 人，成为该教研室的第一批教师。

1955 年初，一批苏联专家去北京中央城市设计院授课，学校派董鉴泓去进修。他被分到苏联专家巴拉金领衔的“大同组”，参与当时中央层面规划的“八大城市”之一大同市的详细规划。回学校后，他马上做了刚学到的“城市用地竖向规划”和“城市管网综合”两个专题报告，又开设了一门新课“城市建设经济”。

1956 至 1959 年，教研室两度邀请东德魏玛大学教授雷台尔来讲授“欧洲城市建设史”和“城市规划原理”。“听课时候，我就想，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建设和发展没有中断过，文明也没有中断过。我们为什么不搞自己的城市建设史呢？”董先生说，雷台尔的课启发他走上研究城市建设史的道路。在 1958 年学校要求填报的“跃进计划”中，他写下了“中国城市建设史”。

1959 年“反右倾”运动开始，因 1957 年“反右”时保护系里的老教授，董鉴泓被划为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，被撤销党内外职务。“空下来，我就去泡图书馆。”他说，在那一时期读了很多书，有些古书恐怕他还是第一个借阅的。在他内心，研究中国城市建设史的想法越来越坚定。1961 年起，他利用暑假，联系上各地规划界的校友，开始了走遍中国的调研……

董先生告诉记者，1955 年 5 月的一段经历常浮现在他脑中：他与冯纪忠先生一起带学

生去“八大城市”之一的兰州毕业实习，承担七里河新区的详细规划和老城区的部分新建详细规划。在对旧区做现状调查时，冯先生总会仔细询问每栋房子的质量、使用年限、大概位置；做规划时，冯先生不是推倒重来，而是尽量保留原有特色。“我对此记忆犹新，这对我影响很大。”董先生说。

1961 年暑假，董鉴泓首先去了泉州。他很想知道，泉州这个宋元时期的国际大港为什么会衰落。他在泉州调查了大量资料，尤其是图纸，最后都编入了他编著的《中国城市建设史》一书。这一年，他还在校开设了“中国城市建设史”课程。

1962 年暑假，董鉴泓带着 1961 年从建筑系城规专业毕业、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的阮仪三，前往开封、郑州、洛阳、西安收集材料，目标是了解宋汴梁城、汉唐洛阳城和唐长安城。印象最深的是在洛阳，一个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，居然送了他们一张隋唐东都洛阳的初步探查成果图！

1963 年暑假，董鉴泓原本打算去河北省调研，结果碰上洪水，临时决定去山西。“正是这次临时起意，让我们发现了平遥。”董先生说，到了平遥，只见城楼、城墙、城门、瓮城、护城河都很完整，街道古色古香。他跑到票号“日升昌”里，看到牌子还挂着，桌上积了一层灰。“古城保存得相当完好，好像时间在这里停下了。”

“建国后，在历史文化城市保护方面，董先生是非常领先的。”阮仪三说，平遥是个起点，

（下转 13 版）➡



董鉴泓先生 1951 年同济大学毕业时的学士照



1962 年，董鉴泓先生与助教阮仪三先生（左）发现平遥古城并促进了之后的保护工作。图为两位老先生近年合影。

照片除署名外均王雅娟提供